

短章随笔辩是非

张曙光◎著

· 经济评论卷 ·
(张曙光文选)

Economic Reviews: Right or Wrong

走进中国经济50人论坛
握手中国最有影响力的
群体经济学家



Chinese Economists 50 Forum
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丛书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短章随笔辩是非

张曙光◎著

· 经济评论卷 ·
(张曙光文选)

Economic Reviews: Right or Wrong



Chinese Economists 50 Forum
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丛书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短章随笔辩是非：经济评论卷/张曙光著. -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6

(中国经济50人论坛)

ISBN 978 - 7 - 5017 - 8605 - 3

I. 短… II. 张… III. 经济学—文集 IV. F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4911 号

出版发行：中国经济出版社 (100037·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3号)

网 址：www.economyph.com

组稿编辑：乔卫兵 (010-64471876)

责任编辑：黄 艳 (010-88377716)

投稿信箱：lily1605@126.com

责任印制：石星岳

封面设计：华子图文设计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1/16

印张：27 字数：429千字

版 次：2009年6月第1版

印次：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017 - 8605 - 3

定价：56.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由我社发行部门负责调换，电话：68330607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68359418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电话：12390

服务热线：68344225 68341878

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 丛书编委会

主 编：吴敬琏 樊 纲 刘 鹤

林毅夫 易 纲 许善达

吴晓灵

执行编委：徐 剑

编 辑：李江洪 朱 莉

编 务：杨 春

总 序

为了向社会各界反映论坛成员的重要成果,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的组织者决定出版一套丛书,为愿意出版自己学术研究成果的成员提供服务。大家推荐我为这套丛书写序,能享有这种殊荣,我感到非常高兴。说明每一位论坛成员的学术背景和每一本书的详细内容,不是我在这里想做的,坦率地说,我也不具备这种资格和能力。我在这里想介绍的是,50 人论坛是怎么成立的,有什么特点,这些年主要进行了哪些领域的讨论和研究。希望通过这样的介绍,使读者对这套丛书的背景有一个总体了解。

—

记得是在 1998 年 6 月,当时的中国经济正处于通货紧缩状态,我感到,需要在经济学者之间对经济形势进行严肃讨论和深入交流,希望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讨论平台,在相同的研究层面上交流学术思想。我和樊纲在木樨地一家小快餐店讨论了这个想法,我们之间有强烈的共鸣,决定发起 50 人论坛的组织工作。论坛的宗旨是,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改革的重大问题献策献力。论坛的定位是,集中国内重大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而不是单纯学术性的讨论,希望邀请国内经济学界各主要领域有代表性的学者参加,进行不定期的交流。我们的想法得到了吴敬琏老师和易纲老师的认同,大家共同倡议,组织一个非正式论坛。把这个论坛称为“50 人论坛”是樊纲的主意,认为这个名称比较符合国际惯例,也可以体现论坛的包容性。当然,实际参加人数并不受 50 人的限制。不久,论坛就成立了。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50 人论坛已经成为中国部分经济学家们讨论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一个重要场合,它不仅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而且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政府主要综合部门在制定经济政策时,经常倾听论坛的意见,或者委托论坛展开讨论。不少领导也以不同方式,认真听

取 50 人论坛对国内重大经济问题的看法。

二

从 50 人论坛的学者名单中不难发现,这是一批才华横溢的学者,是一批在社会上享有相当知名度、被新闻媒体追逐的学者,也是一批极有个性和创见的学者。读者可能要问,什么样的力量能使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并且持续发展?中国各种各样的论坛很多,相当多的论坛具有自发性,但经过很短的繁荣期之后,往往就消失了。为什么 50 人论坛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我的体会,支撑的是三个基本因素:第一个是超前性研究的学术需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支撑论坛存在的基本因素是经济学的需求导向原理。每个成员都需要进行学术交流,都需要进行讨论和辩论,这种讨论和辩论又必须是在同一层面的,论坛恰恰可以满足这种学术需要。第二个是讲真话的学术作风。在讨论问题时,必须实事求是和讲真话,论坛坚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和内外有别的要求,力求发扬求真务实的作风。第三个是相互尊重的文化氛围。论坛的成员有的是职业学者,有的是学者型的政府官员,在论坛内部大家一律平等,发言的时间和顺序与本人的职务没有关系。不能参加某次讨论的学者要请假,没有特殊性和特权。这种空气反映了对中国优秀文化的继承。正是在这样的组织文化下,大家可以自由讨论问题。记得在 2003 年 5 月,当“非典”疫情仍在全社会心理上造成较大威胁的时候,50 人论坛的经济学家们迫不及待地聚在一起,共同探讨这一重大社会事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启示。当时,论坛的组织者在颐和园租了一条龙船,在昆明湖上讨论和总结“非典”带来的宝贵经验。我没有详细考证过,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曾出现过这种情况,但起码近几年在中国没有出现过。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论坛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三

在论坛成立的几年中,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围绕中国发展的现实矛盾和前沿问题,论坛展开了多次讨论。根据档案记录,各种类型的内部专题研讨会召开了 25 次,公开的讨论 80 多次,每年都要召开一次主题鲜明、规模较大的论坛年会。在众多的讨论中,使大家兴奋的题目实际有六个领域。我很难用较短的篇幅把这些领域的问题全部讲清

楚。实际上,即便有充足的篇幅,我也难以讲清楚。在这里,只能简要介绍使论坛成员们兴奋的一些重要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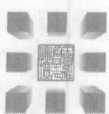
中国宏观经济的周期变化。近几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从通缩到通胀的经济周期。经济周期的客观性不容置疑,繁荣和衰退相互交替,这是大国经济增长的普遍现象。使论坛成员更为关注的问题是:周期阶段发生变化是哪些主要力量推动的,哪些因素具有明显的放大效应,如何区分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对经济周期的不同影响,周期的下一个拐点可能什么时候出现,怎样预测新周期阶段的特征,需要警觉哪些主要风险。

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化和路径选择。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化是人均收入提高的函数,这是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什么中国的人口、土地、水和社会制度约束,决定着中国不可能完全走与发达国家相同的路径。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上,中国怎样以更开放的方式形成关键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在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上,中国怎样避免简单追随刘易斯模式,更重视人力资本积累和形成内生性增长动力。在消除区域增长的差别上,怎样在非均衡增长和均衡增长之间,找到比较好的平衡点。

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定位。中国渐进化和市场取向的改革,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战略制高点是政府与市场角色的准确定位。对政府改革来说,怎样形成基本的动力机制推动这项改革,需要形成什么样的治理框架,怎样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如何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方面,怎样打破垄断和分割的利益格局制约,怎样纠正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竞争不充分所引起的市场机制失灵,怎样创造发挥企业家才能的制度条件。

未来中国经济的国际角色。在不知不觉之间,中国走到了世界经济的前台。巨大的国内市场、超大规模国家的竞争优势和快速的经济增长,引起了全球的瞩目。作为大国开放经济,中国的汇率和利率变化,也引起从未有过的国际关注。未来怎样界定中国经济扮演的国际角色,怎样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和解决重要资源的供给问题,国内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调整怎样适应已经进入全球分工领域的生产力发展要求。

经济与社会协调。近年来,经济学家的注意力逐步从高速增长转向兼顾收入分配。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怎样壮大中等收入者的规模,怎样解决贫困人口的生活困难,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已经起步并且不断深入。正在和继续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处于人均 1000 多美元的发展中大国,解决社



会问题的基调和社会管理机制如何界定,用什么样的矛盾缓冲机制克服凸显的社会矛盾,最终使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纳入和谐社会的轨道。

已经讨论和正在讨论的这些问题,鲜明地勾画出近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基本脉络。如果抓住这六个基本线索,理解其相互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就可以站在较高的起点上。当然,围绕这些问题的实践和学术研究还在继续,经济学家的视角和观点也有相当局限性,但无论如何,这些线索和讨论将为读者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在这个简短序言结束之前,我还想强调一下深化政府管理体制 reform 问题。记得在 2000 年的 6 月份,国内舆论普遍关注国有企业改革。50 人论坛的经济学家们意识到,推动政府改革是下一步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环节,是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重要前提。论坛决定,在古城西安讨论新形势下推动政府改革。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记得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不无感慨地说,西安是中国统一后的第一个古都,当时的中央政府就在这里。2000 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今天我国政府对推动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改革的任务仍然任重道远。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需要抓住改革的关键环节,继续深入开展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向前发展。

50 人论坛成员的著作,是他们个人辛勤劳动的结果,也得益于大家的相互交流。我由衷希望,这些著作能真实描述中国经济社会的实际变化,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刘鹤

2005 年 4 月

自序

这篇自序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总序，简要地回顾我的人生历程和学术生涯。是各卷中相同的内容。第二部分是分卷介绍各卷的内容。是各卷中不同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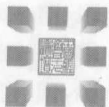


二〇〇九年农历九月初八是我七十岁诞辰，也是我从事经济学学习和研究五十周年。《张曙光文选》的编选和出版，一方面是对自己学术生涯的一个小结，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我的家乡是陕西省长安县秦岭山脚下的偏远农村，距西安市 50 多里。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两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寡母勤劳刚毅，耕织皆是一把好手，在传统社会，能够顶门立户，将我养大成人，教我读书成才，其所受的身体之痛和心灵之苦，是外人难以理解和体知的。先母 1983 年病故，生前母子分处西安和北京两地，我也很少尽人子之孝。对于母亲的养育之恩，我始终怀着深厚的崇敬和感激。

1959 年，我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系统计学专业，开始了经济学的学习和训练。在校期间，对我影响大的老师有何练成、冯大麟、吕其鲁三位教授。我的第一节政治经济学课是何老师讲授的，后来还听过他的多次报告，他传达孙冶方先生价值论的报告我至今还历历在目。我一进校，就从“反右倾”运动的小字报中知道冯大麟和陈维满合作出版了《中国工农业协调发展问题》的著作，冯老师又给我们讲授《国民经济计划》课，因为培养了我这个“白专”典型，并支持和指导我报考研究生，文革中曾经受到冲击和批判；文革后曾任陕西财经学院院长，每次来京总要来家看我，并一起交谈。吕老师给我们教《国民经济统计》，当时因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而受到师生的拥戴，也成为我学习的榜样。

大学时期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我也因营养不良而患了浮肿，腿上一按一个坑，半天起不来。不过我的学习没有放松。当时兴交际舞，很多



同学星期六、星期天跳到午夜12点，我是个舞盲，也不感兴趣，这些时间是在图书馆度过的。《资本论》就是在这个时候读的。

1963年大学毕业，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学校和老师鼓励我考研，帮我报名，给我时间复习准备。结果一举考中，一起录取的还有两位师兄弟杨圣明和李德华。专业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导师是杨坚白教授，副导师是董辅初、刘国光教授。谁知，专心致志学习了一年，接着就是不断的政治运动。1964年经济所批判孙冶方，我们几个来所不久的年轻人被分派去监护顾准；1965年参加周口店农村“四清”；1966年研究生学习期满毕业，接着就是十年“文革”的浩劫和干校的劳动改造。在极左社会思潮的裹胁下，文革初期当过造反派，做过蠢事，中后期挨过整，被打成反革命，隔离审查达四年之久。1968年冬，我婚后一个月离家回京，第二天即被关了起来。我因失去了一切自由，音信全无，妻子在担心、屈辱和泪水中度日；后来可以给家人写信，但必须经过审查；干校时因病住院手术（阑尾切除）也有人监视和看管；大女儿满月时，我被允许回家看过一次，直到两岁多我才第二次见到她，她自然不认识我这个父亲，一见面，竟跟着她的表姐叫我“舅舅”。切肤之痛，深知自由之可贵。这也许影响到我今天的价值立场和人生态度。

1977年开始恢复业务，做的第一件工作是在鸟家培教授主持下，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学习《论十大关系》宣传材料”。实际做研究工作是1979年的事情。该年我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略论自负盈亏”，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至今也已30个年头。

1980年，为了推进经济调整，中央政策研究室组织编写《学习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参加者有林子力、刘国光、曾启贤、胡瑞梁、田光、肖灼基和我。具体任务有二，一是为《资本论》第二卷的每一篇写一篇解读文章，刘国光和我负责第3篇；二是对《资本论》第二卷进行删节，删去2/3。一方面，该书作为干部学习材料广为发行，另一方面，在编撰者中除我以外，都是文革前出道的名家，再加上为了配合这次学习，《经济研究》从1980年第5期开始开辟了一个“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专栏，约我就“学习《资本论》第二卷”连续写了三篇文章。于是，很多没有见过面的学人都把我当成了“老先生”。这就提高了我在国内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和影响。

我接受的是传统经济学的教育和训练。改革开放既是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批判，也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反思。随着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发展，我也经历了一个理论知识转型和研究范式转换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对传统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和解释力发生了怀疑，这种怀疑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日益增长，于是开始学习现代经济学，更新知识结构。这是一个虽不能说是痛苦但也不那么轻松的过程。我原来学习的是俄语，英语是文革后听广播自学的，只能看，而且阅读的速度较慢。因此，我的学习方法有三，一是认真阅读当时翻译过来的著作，凡读过的著作，对其中的基本概念和方法一定要搞懂弄通；二是主动与青年学者一起讨论和交流，虚心向他们学习。其中，与樊纲、杨仲伟等一起研究和撰写《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起了重要的作用。有朋友感到不解，曾经问我，你已经是研究员了，为什么总和年轻人混到一起。三是读书和评书。应当充分肯定，我的知识很多是从书评中来的，这方面的文字也最多。在《评书论人和不同——学术书评卷》和《心交神往知与识——序文前言卷》中，我将对此做出交代。经过10年的努力，我基本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完成了知识转型和范式转换，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在学术界。这时，一些未曾谋面的学人读了我的文章，又把我当成一个青年学者。从这套文集中，读者可以看到我的人生轨迹和学术道路。

我之所以能够完成知识更新和范式转换，也许与我对新事物的敏感和执著不无关系。就以换笔而论，20世纪90年代初计算机还是新鲜玩意，看到个别青年学者使用计算机写作，甚为羡慕，决心效法。1993年，有一个与美国学者萨克斯、胡永泰、史泰利等进行合作研究的项目，我与樊纲等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做访问学者，花2000多美元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回国后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学会了五笔字形输入法，开始照着文稿用计算机“写”第一篇文章“关于地区经济差异的另一种解释”。敲了一半，就干脆扔掉文稿，边思考边输入，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写作方式。

认识到知识更新和范式转换必要性的人，也许不在少数。但真正能够认真实践，并实际完成和实现者很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有没有信心和决心，因为这样做必定是有成本的，而传统理论仍然有其市场和需求；二是能不能下这样的工夫，四五十岁的人要做二三十岁人做的

事情，有些甚至是从头做起，不下一番苦功是完成不了的，不少人也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三是态度和方法，现代经济学的优势在年轻人和留学者方面，对年轻人和留学生的态度，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有人往往以己之长对其所短，瞧不起年轻人；有人又感到年轻人咄咄逼人，对自己名利地位构成威胁。这就妨碍了自己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努力，堵塞了更新知识的路径。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结果，或者抱残守缺，在传统理论的框框内打转转，甚至借学术批评之名做一些政治批判和道德批判的事情，或者告老退休，离开学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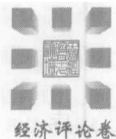
说心里话，我进行知识更新和范式转换，并没有要在理论上做出多大贡献的雄心，只是想延长自己的学术生命而已。应当说，这个目的达到了。古语云，人生七十古来稀。在目前的国内，一个七旬之人，仍然活跃于学术界，还能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理论文章，如果不是独一无二，也属凤毛麟角，恐怕也找不出几个人。如果说，在年轻的时候还有对名利的憧憬和追求，那么，到了后来，读书、思考、写作就成了生命活动的一部分。浸沉在这样的氛围中，整天忙忙碌碌，干自己所想和所好的事情，我的确感受到莫大的幸福和快乐。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的学术创作活动主要是围绕着本单位的重大课题进行的。曾先后参与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产业结构对策”、“2000年的中国”、“深圳发展战略”和“海南发展战略”、“‘六五’经验总结”、“‘七五’国力预测”、“‘八五’改革大思路”，以及“体制变革中的宏观经济稳定”等项研究。这既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一方面，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理论界处于主导、甚至垄断的地位，在改革开放中的确起了打破理论禁区，推动解放思想的作用，政府也有很多重要课题都交给他们；另一方面，自己也比较年轻，既有精力和热情，也需要学习和锻炼。90年代以来，自己开始独当一面，亲自主持了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诸如“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测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目标管理：宏观经济学”、“市场化进程中的宏观稳定”、“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核算”、“城市化背景下土地产权的 implementation 和保护”等。无论是参与研究，还是自己主持，我都注意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坚持自己的理论立场。为此，不仅抵制和对抗过一些人的干预和插手，而且直接顶撞过我的顶头上司，甚至于多次公开辩论，因而以“不听

话”著称。其实，在现行体制下，虽不能说是所有领导，但绝大多数都不喜欢这种有独立思想的人。为此，我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最令人惋惜的是，当时我想出国把英语关过了，以便更好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但领导不给我这个机会。不过，教训也有，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长江考察时，一位同人执笔找我合作写了一篇观点有悖我意的文章，尽管我曾写信说明，但碍于情面，态度不够坚决，他拿去以我们二人的名义发表。此事令我追悔莫及，常常提醒自己。因而，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基本上都是自己动手，不愿依靠他人和自己的学生做事。难怪我的学生的同学对他说，“你们的老板（这里是指导师）真好，从不要你们做事，不像我的老板，我们不得不经常为他打工”。加之，看到一些同人文章依靠学生出现的低级错误，更坚定了自己的做法。在这套文选中收入的文字，有少数是合作研究成果，也主要是我亲自执笔，由他人执笔的几篇，也是由我提出课题和思想，并最后修改定稿。

1993年，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聘为博士生导师，先后带的硕士和博士生有十多名。原规定可以招到65岁，带到68岁，但60岁时单位就一刀切要我退休，此后就没有在社科院再招收博士研究生。不过，编外弟子不少，很多不是我的学生，但在论文的指导以及做人处世方面，我的作用和影响也许不下于他的导师。毕业和工作以后，他们都与我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这里，我想简述一下我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做的事情。这也是我学术活动和人生经历的一部分。1993年7月26日，我和茅于軾、盛洪、樊纲、唐寿宁等五位学者一起，与大象文化公司合作创办了天则所。这是一家创办较早且名实相符的非政府非营利机构。其宗旨就是要坚持和实践自由思想和自由讨论的学术理念，推动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实践。天则所创立以来，其活动有成功，也有失败，工作有波动，也有起伏，内部有矛盾，也有争论，但终究坚持了十多年，并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其他方面的事情暂且不论，仅就我所负责的学术工作（我一直任天则所学术委员会主席，1999~2002年任所长期间，名义上不是实际上仍然代管学术工作）来说，诸如，较早地组织举办了天则双周学术论坛，至今已经坚持了350多期，为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搭建了一个自由交流的平台；现在各种各样的论坛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1997年开始进行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每个季度提供一个分析报



告，举办一次“宏观中国”论坛；现在宏观分析已经是群雄蜂起，诸家竞争。率先把案例研究引入国内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组织和主持了《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现已出版了五个案例集。另外还组织编辑出版了《中国经济学》系列14集和组织了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未来天则所如何发展，会达到一种什么地步，既取决于外部环境，也取决于天则理念的坚持和战略的选择，同时也与内部治理有关，这里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现在还很难预断。就我自己走过的道路来看，创办天则所既有很大的付出，也有不小的收获。

在我出道以后，曾经有好几个中央部委的研究单位请我去当官，拟任命我做研究院院长、研究所所长之类，并承诺解决诸如住房之类的实际问题。由于长期住在三里河名为两室实则一室一厅的住房内，架床叠桌，女儿从学校回家只能打地铺，唯一的希望是能有一张四条腿的床，夫人希望能够有一个朝阳的房子，朋友也劝我能够满足一下夫人的愿望。这些都是正当的要求和愿望，人情入理，毫不过分。但考虑到自己生性耿直，崇尚“独立意志，自由精神”，不愿趋炎附势，曲意逢迎，既不愿当官，也当不了官，同时深知到各个部门以后，就得围绕着领导转，用自己的笔去表达别人的思想，写文件，写讲话稿，没有了能够自由自主做学问的条件和环境，因而执意不去。甚至对夫人说，“你要是想让我少活几年，咱们就去当官”。因此，夫人批评我自私自利，我也无言以对，在这件事情上也许如此，我也是常人，并不那么高尚。到现在，在房子问题上，夫人的心愿仍未实现。这也是我非常歉疚的事情。

我之所以不去当官，也不去经商做企业，还有深一层的原因，虽然这些职业是社会必要的，也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但必须采取官方的立场和为营利而奋斗。而我则有着一个独立学人的情结，喜欢做一个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我只是想自由思想，自由言说，对任何事物保持一个批判的态度。至于我的观点和看法是否符合正统意识形态，能否被官方和业界接受和采纳，这是他们的自由和权利。

我的专业方向是宏观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但实际所做的研究内容则比较广泛。根据研究工作涉及的内容和方面，我将《张曙光文选》设计为五卷，分别是：

《入道求索未驻足——学术论文卷》，

《心交神往知与识——序文前言卷》，

《评书论人和不同——学术书评卷》，

《短章随笔辨是非——经济评论卷》，

《真实有用稻粱谋——研究报告卷》。

人常说，文如其人。从这些文章中，不仅可以了解我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态度，而且可以了解我的脾气禀性，为人处世。总之，可以对本人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当然，是非功过，任由大家评说，这套文选就是一个靶子。

二

三十年来，我撰写的经济评论不下三、四百篇，其中，一半左右分别收随笔集《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1996）及其修订版《繁荣的必由之路》（1999）、《经济学家如何讲道德》（2002）、《经济自由和思想自由》（2004）和《为什么中国缺少像样的企业家》（2004）中。这个《经济评论卷》收入的除上述几个集子中部分精彩篇章以外，包括三个部分，一是70年代末的几篇，由此可以看到我入道时的情况；二是80~90年代的几篇，三是近几年的新作，这是大部分。

由于本人的脾气、禀性和志趣，正像在《经济自由和思想自由》一书自序中所说，这些文字“大多是针对当时发生的一件事情或者一种现象，一事一议，借题发挥，小题大做或者大题小做^①，从理论上给以解释，或者阐明一个道理，因而往往是开门见山，直入主题，不仅用不着绕弯子，兜圈子，而且充满激情，一吐为快”。也正是因为这样，在现在的情况下，其中有的文章背后还有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这里选几个讲讲，既可使气氛轻松一点，也可以了解我们的生存环境。

“人格和国格”与“政府职能和市场规则：界限和实施”两篇有关，都是评论《东方时空·焦点访谈》节目的。前者评论了节目主持人白岩松先生关于外国女老板让中国工人下跪事件的报导和评论，指出“主持人仅仅从国人失格、失节的角度予以评述，未免有点就事论事，过于简单化”，我认为“首先，对女老板的所作所为可以做出评论”，“其次，对于有关政府部门的态度可以做出评论”，“再次，对于中国的社会组

^① “或者大题小做”一句是本文加上去的，因其中的部分文章，如“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等，就是这样做的。

织，这里主要是工会的行为和作用，也可以做出评论”。然而，白先生对女老板的违法侵权行为未做任何评论，对其他两点，更是噤若寒蝉。而我在评论政府部门的态度时，却画龙点睛地写道，“如果政府不能为自己的老百姓撑腰做主，一部分工人的软骨病也就不足为奇了”。我夫人做新闻工作，文章发表以后，她给白岩松写了一封信，并将刊发该文的杂志寄去。后来，有人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制作一个节目，请我参与，在饭桌上见到了白先生，我向他聊起这个节目和评论的不足。白先生非常傲慢，随口一句“我哪儿有时间讲那么多”，就不再理会。10分钟的节目，居然说没有时间。2000年，敬一丹女士主持了一期节目，讲的是河北某市环卫局和工商局因一专业市场垃圾清运费的分配发生争执，垃圾无人清理，最后《东方时空》介入，市领导出面找两局协调，半天就解决了问题。对此，敬女士点评的大意是，两局为了部门利益置广大群众的疾苦于不顾，领导出面，半天就解决了拖了半年的问题。笔者认为，这样的点评“过于肤浅，除了在传统观念中打转转，进行一些政府要关心人民疾苦之类的说教以外，既未揭示出问题的实质，也没有讲出什么像样的道理。给人的印象是，类似事件的解决只能依靠《东方时空》为民请命，依靠政府领导的恩赐”。接着，笔者从三个方面做了评论，明确指出，“从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来看，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悖理的”，“即使退一步，从市场交易关系来看，这件事情的很多情节也是荒谬的”，这件事情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各种规费的收取和管理问题”。在文章的开头，笔者讲了与白岩松的遭遇；在文章的结尾，笔者讲了写这篇评论的两个目的，“一是明辨是非，讲明如何看待这类事件，澄清发生在这里的思想混乱；二是借此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编辑、记者和节目主持人是否也有一个重新学习和继续受教育问题，是否有一个先当学生后当先生的问题？如果能够给予肯定的回答，并切实予以实践，目前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传媒中的错误、笑话、辞不达意、隔靴搔痒、陈词滥调、夸夸其谈等就会大大减少”。因当时我记不清故事发生的具体城市和做节目的准确时间，我夫人写信给敬女士，说我要评论她的节目，问她是什么时候播出的，并建议她做节目前可以先请教一下专家。结果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开始时，夫人每天都要收看《东方时空》，我也跟着经常收看。自此以后，我和夫人都不再光顾了。再加上我的一位高中同学来京请《东方时空》做节目，讲了一些有关如何上《东方时

空》的故事，民间传颂的那首打油诗也就见怪不怪了。

“简议经济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以海洋天然气化肥项目落址洋浦为例”是一篇有着深刻背景的评论，当时不便明言，今天可以公开。最近有关当事人写了一篇文章“民间三亚保卫战”，首次披露了有关内情，很值得一读。本文的入选并将“民间三亚保卫战”作为附录，是因为我们目前的很多重大决策仍然重复着三亚大化肥决策的老路，而体制内外的关系和合作更加微妙，在推进改革和抵制某些错误决策上更不顺利，也更难以施展拳脚。所以，借此旧事重提很有意义。当时，南海打出石油和天然气，决定在海南岛建设化肥厂进行加工。在化肥厂的选址问题上，有三亚市、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国家计委和国务院领导的支持，并经过国家权威咨询公司的论证，省委、省政府有不同意见而三缄其口，实际上等于默认，大化肥厂落址三亚似乎是板上钉钉。在这种情况下，先由媒体披露信息，为动员民间参与提供由头；接着由我以天则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和海南发展战略主报告执笔人的身份出面主持，组织环境、资源、化工、海洋、经济、管理各方面的专家重新论证，为体制内的运作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最后把论证报告交曲格平转呈王丙乾、万里等领导批示，将大化肥项目移址洋浦。正如“三亚保卫战”一文所说，其运作过程是“媒体突破，民间 NGO（非政府组织）跟进，借助科学家、经济学家和有威望的社会人士来强化民间力量，再寻找体制内的合适人选，把民间的意见和意志强有力地输送到体制内去。”这“可能是国内目前为止，最成功的民间力量与和体制内力量合作，干预环境污染大型建设的案例。”

关于残疾人问题，我曾写过三篇评论文章，本书收入的“残疾人就业问题：理论和政策”是第一篇，是1989年写的。其他两篇是“谈谈残疾人的全面康复”（1990）和“救助和参与——从‘远南’的胜利说开去”（1995）。该文的由来是这样。当时，我想讨论和宣扬一下“个人权利”和“人道主义”的思想理念，但没有一个由头，因为直接讨论很难发表。随着“优化组合”的推进，残疾人就业成为一大问题，残联领导非常关注，我从在中国残联工作的夫人口中得知此事，感到这是讨论“人权平等和人道主义”问题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和角度。于是写了这篇文章，由她送给残联领导。残联领导看后非常高兴和重视，多次请我参加座谈会和讨论会，聘我为残联的特约研究员。该文在《中国残疾人》